

二、學思歷程

（一）開始中國史研究的背景

問：感謝佐藤教授能接受訪問，讓讀者對您的學術研究背景及其成果有更深入地理解。

答：首先非常感謝漢學研究中心能給我這樣寶貴的機會。與之前刊登在《漢學研究通訊》「漢學人物」欄的著名漢學家相比，我可能有些太年輕了，而且也沒有取得像他們那樣豐碩的研究成果。我能夠被提名，並不是因為我個人的研究成果可與他們媲美，而是意味著我參與的研究團隊以及我繼承的日本漢學研究方法和成果得到了一定的認可。因此，我希望能夠利用此機會，與大家分享一下我所繼承的學術譜系，以及過去十五年所參加的田野調查團隊的調查方法和成果。

問：請問是什麼讓您對中國感興趣，進而走上研究中國史的道路呢？

答：從小學起我就很喜歡歷史，特別喜歡社會課和歷史課，進高中的時候我就有一些想學歷史學的想法了。高中時我對包括歐洲史和美國史在內的世界史很感興趣，其中中國歷史上反復的王朝興起、被革命推翻，以及與周邊民族的關係等等，這些與日本史不同的動態深深地吸引了我。高二我選擇了文科，也是因為我覺得我會去讀歷史系。

最終我選擇學習中國史主要有三個緣故。第一個是高三時發生的天安門事件。日本各電視台播放的事件情景以及與此相關的報導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我對中國更加感興趣。當時網路還未普及，信息很有限，所以還只停留於莫名的興趣。第二個是大學的第二外語。我的母校慶應義塾大學文學部，在申請入學考試時就需要選擇第二外語。那時有傳言說，選擇中文更容易通過入學考試（笑）。當然，我是因為對中國感興趣所以才選擇了中文。入學後，我就開始學習中文，自然而然地就對中國更加感興趣了。與此同時，我開始對講述這種語言的人們以及社會也產生了興趣。第三個是到中國留學。本科生的時候十分流行一邊手拿《地球の歩き方》（走遍全球），一邊利用廉價機票或船票去世界各地背包旅行。當時澤木耕太郎的《深夜特急》很受歡迎，

有很多追隨者。而且當時日圓升值，日本還處於泡沫經濟高峰時期，只要打工賺一些錢就可以去那些發展中國家旅行。當時很多大學生都利用假期去世界各地「貧乏旅行」（廉價旅遊）。例如我的一位朋友，坐船到中國後，乘坐火車去了西域，之後又去了巴基斯坦。由於我在學中文，所以我很想去中國看看。大二的春假，我坐「鑑真號」輪船前往中國，利用兩個月的假期先後訪問了上海、北京、西安等地。那時沒有錢，所以住的都是1晚500日圓左右的青年旅館。讓我記憶尤深的是，雖然當時中國與日本的經濟差距比較大，但社會整體充滿了活力，人們也不拘小節，這樣的中國深深地吸引了我。大三的時候，我自費去復旦大學學習中文一個月。課程結束後，我又去中國各地旅行了一個月。這樣的短期留學和旅行，逐漸地讓我有長期留學的想法。我希望能夠精通中文，能用中文去更深刻地瞭解中國。那時我真的沒有考慮過要成為一名學者，可能因為當時還有泡沫經濟之餘潮，所以對畢業後的規劃比較樂觀，只想一心學好中文，並且想讀碩士提高一下專業知識，然後去企業或者報社工作。

除了留學之外，山本英史老師的研究班也是我想攻讀研究生的主要原因。從大三開始我們需要參加研究班，我選擇主修山本英史老師的課。因為我對明清史感興趣，還有就是我深深地被其人品所吸引。山本老師的研究深受行內人的認可，但對當時的我來說可能有些太難了。然而，他解讀中文史料的能力和對史料細緻地分析，以及思考問題的邏輯思維都讓我十分敬佩。雖然我已成為一名老師，也到了當時山本老師的年齡，但我在很多方面都難以超越他。一直以來山本老師十分注重學生的自覺性，只要是我想做的事就從來沒有阻止過。從學生時代開始我就有一個習慣，只要一到假期我就去中國，山本老師也很重視這種對當地的瞭解和掌握，所以他一直都很支持鼓勵我這種作法。我偶爾還會和山本老師在中國會合，然後一起去觀光或查閱史料，還記得第一次去第一歷史檔案館也是和他同行的。晚上一邊喝酒，一邊聽他講述獨特的中國社會論，讓我學到了很多東西。畢業後，我們也一同參加了科研項目的田野調查。身為他的第一個研究生，能受到山本老師的指導，

是我無上的榮幸。

（二）留學經歷

問：您在留學期間有什麼樣的收穫？

答：我在大四的時候，利用慶應義塾大學的交換生制度，前往復旦大學留學一年。只要我向慶應義塾大學繳交學費，在復旦期間的學費和住宿費就都由中方負擔。決定留學後，我便開始考慮除了中文之外還能學什麼，也很想和中國的大學生一樣上一些專業課。在此過程中，我對上海和江南的歷史產生了興趣。當我查閱復旦大學的各種信息時，瞭解到有一位名叫樊樹志的老師研究江南的市鎮。我請求山本英史老師幫我聯絡樊教授。就這樣，我在留學期間選修了樊教授的課，其中包括他在國際文化交流學院開設的「明清江南市鎮研究」，以及針對研究生開設的「近代江南農村研究」和「明代政治史」。那時選修「明清江南市鎮研究」的只有我和另外一位日本留學生。由於她提前回國，所以最後一個月只剩下我一個人。很榮幸的是，那一個月樊教授特意來留學生宿舍為我單獨講課。當時的課堂筆記我到現在還完好地保留著，可以說是我的一個寶物。樊教授在課上介紹了滿鐵的華中調查，也分享了他與濱島敦俊教授一起進行田野調查的經歷。讓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常常強調田野調查的重要性，當時我萬萬沒有想到自己後來會去進行田野調查。但是現在回想起來，樊教授的課使我無意識地學到了田野調查的重要性，這也可能是之後的一個暗示吧。真的要感謝樊教授在我留學期間的悉心教導。

通過留學我還結交到幾位好友，其中一位就是現在在中國大陸很知名的侯楊方教授。侯楊方當時跟著樊樹志教授讀碩士一年級。留學期間，我不太和留學生交流，一週之中有五天都與侯楊方和另外兩個好朋友進行語言交換。他語速很快，我的聽力應該是他鍛煉出來的吧。那時我們一起上樊教授的課，課後我們還就一些學術問題展開討論。記得那時候楊方正在寫反駁黃宗智教授「內卷化」的論文，所以我們就這個問題也展開了討論。雖然當時的討論比較幼稚，但真的很開心，也讓我慢慢地感受到了學術的樂趣。另外，留學期間我還在上

海參觀了很多歷史遺跡，自然而然地就能感受到歷史的薰陶。印象很深的是，我的學弟來上海探望我的時候，我們與侯楊方一起去了同里鎮和費孝通曾經調查過的開弦弓村。在交通不是很方便的時代，三個學生去這樣的市鎮和農村觀光，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這樣的經歷也讓我對江南研究更感興趣。可以說，這一年的留學經歷決定了我之後的研究方向吧。通過留學我結識到了樊樹志教授和侯楊方這樣的貴人，也親身體驗到中國文化的深奧以及人際交往的樂趣。

（三）求學期間受到的學術影響

問：您的求學過程中，哪些學者和著作給您的影響較大？

答：1980年代的明清史研究中，「地域社會論」特別受到矚目。這其實是與當時中國的情況密不可分的。之前老一輩的學者們在研究時，受到「革命史觀」的影響，認為中國是革命的先驅、中國的社會主義是值得參照的榜樣。然而，改革開放後大家瞭解到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在這樣的情況下，學界關注的是根深蒂固的中國傳統之不變性。換句話說，中國是一個不容易改變的國家，有必要關注其連續性。為了闡明中國固有傳統是怎樣形成的、又如何影響到近代和現代等課題，明清史研究便受到了關注。受到恩師山本英史老師的影響，我也想研究明清史。在整理明清史研究動向的過程中，我瞭解當時很盛行地域社會研究——特別是以各種中間團體或社會組織為線索來看中國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岸本美緒的種種方法論上的討論、森正夫和濱島敦俊的研究、上田信和山田賢的宗族研究等，都給我很大的影響。漸漸地我也很想從這樣的方向探討江南社會，特別是江南市鎮的地域性和社會組織的關係。

另外，人類學研究也受到關注，特別是關於宗族研究有很多傑出的成果。例如，以香港新界或東南亞為對象的研究、瀨川昌久和華琛（James Watson）的研究都給我很大啟發。這些學者的著作是我在另一位導師可見弘明教授的研究班上開始接觸的。通過對人類學的學習，我意識到不能僅僅局限在歷史學內，需要吸取一些分析現代領域的經驗。此外，碩一的時候，早稻田大學

和慶應義塾大學的幾位研究中國文學研究生共同創辦了「中國都市藝能研究會」(中國城市戲曲研究會)，很幸運我也是成員之一。通過與他們的學習和交流，我領悟到結合歷史學、人類學、文學等跨學科領域的角度研究中國戲曲的必要性，以及從多種角度觀察中國和中國社會的觀點。

另一個是溝口雄三的《方法としての中国》(《作為方法的中國》)。這本書當時很受歡迎，主要是因為當時存在著如何理解中國、理解社會主義，還有如何理解那時十分受矚目的新興工業化國家(NIES)等課題。很多人發現：嘗試將亞洲經濟發展的歷史背景與中國相聯繫的時候，用日本傳統的中國觀無法完全處理。當大家苦惱如何理解該現象之際，溝口教授的這本著作問世了。當時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三、學術研究

(一) 地方精英研究

問：不知您是如何選擇本科畢業論文、碩士論文、博士論文的題目？

答：本科畢業論文我想寫正統的明清史。1980年代的研究，是將明末清初做為一個重要的轉折期，認為以明代江南為中心的商業發展帶給中國巨大的變化，焦點集中在如何去理解明末清初的轉變。留學期間，我在學習中文的同時還需撰寫畢業論文，所以便開始在上海收集史料。但由於那時上海圖書館正向淮海路的新館搬遷，我沒能看到古籍部的史料，所以只能去復旦大學的古籍部查閱地方志和族譜。當時我深受上田信教授的影響，也想做類似的宗族研究。在查閱族譜的過程中，我發現了上海曹氏的族譜。曹氏一族裡出了兩位進士，也有幾位舉人，可說是清代中期取得了一定成就的宗族。該族譜的記載十分詳細，可以從中瞭解到族人的通婚圈。另外，在地方志中也有相關記載，其中一些族人在文集中也有一些文章，他們還積極地參與地方水利和慈善事業。畢業學位論文我就以曹氏一族為中心寫的。之後在侯楊方的幫助下，我把其中一部分改寫成單篇論文，發表在學術期刊上(〈清朝中期江南的一宗族與區

域社會：以上海曹氏為例的個案研究〉，《學術月刊》，1996年第4期)。

碩士論文我想以同樣的方法展開研究，但沒有找到相應的史料。眾所周知，宗族研究主要以華南為中心展開。但是我想研究江南，特別是將市鎮和宗族結合在一起，探討以市鎮為中心的地域社會與宗族的關係。碩士的時候，由於沒有很好的史料，這讓我十分糾結。隨後我嘗試把時段移至清末民初時期，倒是發現了很多相關史料。讓我記憶猶新的是碩二暑假，我以新編地方志為線索在上海找到了很多史料。其中包括了一個生活在上海郊外城鎮的宗族族譜和文集，還有他們編纂的鄉土志等，這才讓我有自信能完成碩士論文。在此過程中，出現了如何分析從宗族延伸出來的士紳問題，我便開始積極地吸收士紳研究以及地方精英研究的成果，希望在參考這些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利用「地域社會論」的方法探討清末民初的情況。換言之，與其說將目光停留在近代，不如說是通過探討這些人如何經歷清末民初此一傳統轉換至近代的。撰寫碩士論文的過程中，我發現江南存有多種多樣的地方文獻，包括鄉鎮志、鄉土志、文人的文集等等。完成碩士論文之後的1997年春天，我再次前往上海收集史料，發現了更多當時中國學者尚未關注的縣級和鎮級的地方報刊。就這樣，我漸漸地注意到在江南生成歷史史料的「磁場」。具體來說，當時的人們並沒有想要將被我們稱之為一手史料的東西保留下來，而是我們後人「發現」、「產生」一手史料「磁場」的事實。我的博士論文進一步深入地討論了這些問題。總之，碩士和博士學位論文可說著眼於地方、地方精英與地域社會的關係，甚至是保留文獻的地方人物之研究。雖然我的博士論文於2013年出版，但大部分乃是基於1990年代的問題意識而寫就的。

(二) 江南基層社會史研究

問：您為什麼開始進行田野調查？

答：誠如前述，留學期間樊教授的課讓我無意識中領悟到田野調查及閱讀前人田野調查成果的重要性。另外，與侯楊方訪問江南各地的體驗，也讓我對田野調查有了一定的印象。但碩士和博士期間在江南收集地方史

料的成功，讓我覺得可以持續地收集這樣的地方文獻，所以最初並沒有想到自己會去跑田野。

我從 2001 年起在滋賀大學任教。那時候楊方越來越忙，沒有辦法繼續陪我去收集史料，於是他建議我與當時還是復旦大學博士生的吳滔一起去。我與吳滔於 1998 年在蘇州大學召開的中國社會史學會上相識，當時我們是相互的評論人，但那次之後就一直沒有聯繫。就這樣，我與吳滔 2002 年 8 月再次相遇，一同前往吳江、常熟、蘇州等地的圖書館和博物館，發現大量的族譜和日記等一手史料，還很興奮地就史料的使用方法等問題展開討論，這也使彼此變得更加瞭解。對我來說，2002 年和 2003 年調查的首要任務是收集地方文獻。當然，我也一直認為有必要將視野擴大到基層。比如，我的博士論文裡所利用的地方報刊，在 1910、20 年代便刊登了很多與民間文化有關的文章。這些幾乎都是知識階層將民間文化視為啓蒙百姓的內容。雖然有一定的限制，但我感覺只要大量收集相關文章的話，就可以分析地域社會與民間文化的關係。結果發現，就算我收集再多也沒有很大的用處，知識階層的偏見終歸還是偏見。

正在猶豫如何將研究視野擴大到基層時，2004 年以太田出教授為首的科研項目「清末民國期江南三角洲市鎮社會的結構變動與地方文獻之基礎研究」正式通過，主要成員包括太田出、陳來幸、稻田清一、山本英史老師和我。該項目之主要目的是關注那些沒有被記載的所謂「田間小民的鄙事」，亦即那些被士大夫認為是沒有意義的、無需記載的、或他們一直帶著有色眼鏡去觀察的民間文化。為了突破這些限制，調查團隊打算在收集地方文獻的同時實施口述訪問，以及參觀那些又「復活」的廟會儀式。其實我們的調查，最初以收集地方文獻為主要目的。當時通過吳滔牽線，結識許多幫助我們的當地朋友，有機會參觀漁民的儀式、廟會以及宣卷的上演等等。很快地，我們就對田野調查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從 2005 年起全面地展開口述訪問。在調查中，逐漸地開始關注農村和漁村社會之中存在的共同性以及空間性問題，也開始思考如何與日本在戰爭時期的華中調查和以村落共同體論爭為首的相關討論展開對話，並從中找尋我們團隊的獨創性。我們的調查也發展到第二期

科研項目「解放前後太湖流域農漁村的『鄉土社會』與田野調查」。通過這兩期調查，我們對濱島敦俊教授未能深入探討的漁民社會組織及信仰組織、漁民的生命史等問題，取得了一定的收穫，這是調研團隊的重要成果之一。就這樣，我的研究從最初關注縣級別或鎮級別的地方精英，慢慢地下降到基層社會士紳，又逐步地擴展到周邊的人群。田野調查讓我的研究有了這樣轉變，也有機會去接觸這些人群。

（三）基層社會周邊的人群

問：近年您的研究對象擴展到山村社會，請問這種轉變有什麼樣的背景？

答：從 2007 年到 2010 年，太田教授和我參加科研項目「東亞海域交流與日本傳統文化的形成：以寧波為中心的跨學科構建」（主持人：小島毅）中的田野調查部門「圍繞海域的地域社會」，對浙江省的水上居民進行了調查。太田教授原本想針對海洋漁民展開調查，但進展沒有那麼順利。之後他邀請我加入調查，在吳滔的幫助下，我們試圖通過對九姓漁戶的調查分析浙江的水上居民。九姓漁戶主要活動在杭州周邊以及錢塘江流域一帶，所以我們從杭州開始調查。但是，杭州城市化的進展，讓我們很難找到相關人士。當我們調查到錢塘江上游（新安江）的建德時，終於發現了很多線索。在此過程中，我們認為有必要調查江南後方地區的錢塘江以及浙江省山區。因為九姓漁戶除了漁業之外，還有很多人從事航運業，他們把木炭及木柴等林產搬運到杭州和上海下游的大城市。由於我們慢慢地習慣了在中國的田野調查，再加上吳滔的充分安排，2007 年開始的九姓漁戶調查進展得十分順利。這一時期的採訪，甚至可能是我們最成功的口述調查（相關的口述記錄打算以《七里揚帆：建德、桐廬九姓漁戶調查報告（擬題）》出版）。就這樣，我的問題意識擴展到被搬運的林產，也開始展開了對山村的調查。這也成為了 2013 年開始的與浙江大學的合作項目：「關於近現代太湖流域農山漁村自然資源管理的田野調查」（主持人：佐藤仁史）。經過數年調查，我們出版了羅雪昌著，杜正貞、佐藤仁史、陳明華、宮原佳昭、相原佳之編《見證：一位農民的新中國

七十年》(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9)，以及杜正貞、佐藤仁史編《山林、山民與山村：中國東南山區的歷史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0)。

自 2009 年我到一橋大學工作後，有很多學生研究東北農村，因此我在東北也開始了文獻調查和田野調查。我發現東北與江南不同，相對上比較保守，史料並不是很開放。但是東北也有它獨自的特徵，那就是東北與日本有著密切的關係，我們可以從這一點著手尋找一些相關史料。之後我就開始關注中國殘留日本人以及遣返日僑的問題，通過與他們的接觸收集一些相關史料，還展開了口述訪問。其中最關注的，就是遣返日僑的個人文書以及相關遣返日僑團體所發行的會刊。在此中記錄著很多日本人的「滿洲經驗」，是十分重要的史料。可能很多人認為遣返日僑與江南沒有任何關聯，但我通過對遣返日僑和殘留日本人的調查發現，這些人回到日本後是受到歧視的群體，是沒有辦法融入到日本社會的一種「族群」。雖然同樣是日本人，但在細節部分還是會有很大的分歧。對於我們來說可能只是很微小的差異，但對當事人來說這是決定其認同的重要問題。這也讓我覺得在觀察江南的地域社會時，也有必要關注這樣的「邊緣人」的問題。要是我一直只研究江南的話，可能不會發現這樣的問題。我很幸運這些年可以退後一步來看江南，這讓我有更加豐富的觀點和視角。

四、田野調查

(一) 田野調查的契機及其成果

問：能請您再講述一下田野調查及其成果嗎？

答：除了 2007 年到 2010 年的「寧波計劃」之外，我們科研團隊共主持了三次項目，其中以太田出教授為名有兩次（2004-2006 和 2008-2011），我則有一次（2013-2016）。2020 年我開始了一項個人的項目「關於近代中國『風俗』論的社會史研究」，可以稱之為第四期，主要是圍繞太湖流域的調查。回想這四期的調查，最幸運的就是遇到了很好的合作夥伴。中山大學的吳滔教授是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合作人，一起進行田野調查。這對於他來說可能沒有直接的收穫，但他還是一直耐心

地陪伴我們。要是沒有吳滔的幫助，我們的田野調查是無法獲得成功的。當然有時候會就一些想法或方法上的事情而爭辯，但那時每天一起共事，並能隨時交換各種意見，使我們在學術和調查方面都積累了十分寶貴的經驗。第四期調查的研究計劃以及方法，也是通過吳滔接觸到「華南學派」的方法論後，在 2016-2017 年的香港訪學期間親身與華南學派學者的交流中構思出來的。吳滔不僅僅是在江南調查方面給我很大的幫助，在方法論上也讓我學到了很多。真的十分感謝他一直以來的陪伴。

第三期的合作人是浙江大學的杜正貞教授。到了這個時期，吳滔在中山大學的校務越來越繁忙，不能像之前一樣陪伴我們進行調查，於是他就把杜正貞和陳明華（杭州師範大學歷史學系）介紹給我。杜教授深受華南學派的影響，自身也長年參與田野調查，是一位非常優秀的學者。她十分擅長田野調查，所以之後的調查都由其協助，細心安排完成的。對外國學者來說，田野調查的成敗取決於與當地合作人的關係，因此如何選擇十分重要。身為合作夥伴，不能只根據關係好壞來選擇，應該注重對方是否有田野調查的經驗及是否利用相同的研究方法。但是，性格合適與否也很重要，合不來的話調查工作就很有可能以失敗告終。從這一點來看，我真的很幸運遇到了他們這些可以發自內心展開學術討論的優秀學者，與他們的合作與交流，也使我的研究有了很大的進步。

第四期調查雖然形式上是從 2020 年開始的，但我從 2018 年就已與蘇州科技大學的老師和學生展開。2015 年我擔任蘇州科技大學兼職教授後，在與學生討論田野調查方法的同時，也通過實際的調查來累積經驗。我在 2019 年傳授該校有關田野調查方法時與一位碩士班研究生相識，他在蘇州找到很好的研究對象，並且與當地人建立了一定的人際關係，也收集到許多相關史料，進行大量的口述訪問。目前我們已有 43 萬字之多的口述訪問記錄，這是第四期調查的基礎之一。

順帶一提，隨著年齡的變化，自己在調查中的位置與方法也有所不同，所經歷的情況也不一樣，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寶貴的經驗。剛開始田野調查時我僅有 32 歲，

現在馬上就要 50 歲了。最開始的合作夥伴是年長者，之後是同齡人，現在是比自己年輕很多的青年學者。恰恰與我的年齡相反，合作夥伴反而是越來越年輕的學者，最後的目標可能是我自己也成為受訪人吧（笑）。就好像現在帶著學生調查一樣，希望在田野中能把我的長年積累的經驗傳授給他們。我猜這是每一位進行田野調查的學者都會有的感受吧。

問：請問您從之前的日本人調查中得到了哪些啟發，並如何去與這些研究進行對話？

答：日本人在中國農村展開田野調查時，一定要立足於老一輩的調查資料，並與他們的出版成果進行對話。日本的中國農村調查早自戰爭時期就已開始，可以稱他們為第一代。1980 年代後，在江南地區森正夫和濱島敦俊的團隊，以及在華北地區三谷孝和內山雅生的團隊分別展開再調查，可謂為第二代。第三代就是像我這樣的，直接或間接的接受過第二代教育的學者，例如有三谷孝教授的弟子田原史起、山本真等等。日本各個世代的學者，分別在不同的時間段進行了田野調查，積累了 1940、1980、2000 年代等不同時期、不同層面的中國農村記憶。通過調查我逐漸發現這些記憶的重要性，今後有必要將各層次積累的記憶相互參照，並通過對比來理解不同時代、不同世代之間的變化。另外，被講述的記憶與引導他們講述的「磁場」有著密切的關係，所以我們在研究時還需要注意這些不同的「磁場」帶給記憶的影響。

在第一期到第四期的調查中，我們重視的是民間信仰，其主要原因有三點。第一點是日本學者江南調查的傳統。無論是第一代還是第二代的江南調查，都十分重視民間信仰在基層社會的統合中所起到的作用。譬如，戰爭時期在蘇州郊外農村展開調查的林惠海將「農地、農家、農神」視為理解江南農村的關鍵線索；作為林惠海助手的福武直也早就指出了信仰圈在鄉鎮社會中的重要性。第二代的調查中濱島敦俊教授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出發，重新探討了第一代的觀點，並將鎮城隍廟管轄的信仰圈形成過程定位到歷史脈絡之中。我們的調查在繼承這些前人的成果之上，針對信仰圈的實情展開了口述調查。

第二點是日本中國農村研究的學術傳統。長期以來日本的中國農村研究十分重視對村落共同體的討論，很多研究已指出：中國農村不存在與日本村落相同的村落共同體。那麼，我們有必要考慮是什麼因素讓基層社會的人們連接在一起的。我認為，中國基層社會通過信仰或種種禮儀而形成、存在的社會秩序，可以說是中國的特徵。科大衛教授指出，中國展開了種種禮儀革命，通過各種形式的禮儀形成了社會秩序。今後有必要通過對各個地域的分析，更進一步探討這些禮儀的實情。很慚愧的是 2004 年的時候我還沒精讀科大衛教授的著作，但當時已開始關注到基層社會通過神緣整合在一起，這也是由於我們團隊初期調查深受濱島教授研究的影響。另外，還有濱島教授沒有直接引用的福武直有關信仰圈的討論，也給予我們很多啟發。

第三點是調查環境的轉變。2004 年開始田野調查之後，我們得到了觀看以廟會為首的種種民間文化的機會。在此過程中，我們深深地體驗到改革開放政策以後民間文化在江南的復興。不得不說，2004 年前後，想從正面去調查這些與民間信仰有關的活動是有一定困難的。然而，由於之後非物質文化遺產熱潮的到來，這些民間文化被認定為非物質文化，使我們更容易進行調查。

在繼承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我們團隊的主要成果可說通過調查及分析，更進一步地證實了濱島教授的假說。此外，對同時代民間信仰、禮儀的探討，是我們主要的收穫；對漁民和漁村的調查也是成果之一；還有就是調查的時候，我們能夠採訪到一些 1920 年代、1930 年代出生的老農民，從他們身上獲取到一些關於 1949 年以前的情況。現在展開調查的人，應該已經幾乎無法對這一代的人進行口述訪問了。

問：出版口述記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成果。請問你們為何決定出版口述記錄？

答：第一期和第二期的調查有些過於強調口述訪問了，這既是我們調查工作的優點，也可說是我們的缺點吧。為了其他學者也可以利用調查成果，我們將口述訪問進行整理，以口述記錄集的形式出版。用吳滔的話來說，我們太執著於「編纂史料」了，而華南學派的學

者是更重視如何在現場閱讀史料，也就是注重在地方收集史料的同時，還注重如何在地方的脈絡中閱讀這些史料。如吳滔所言，「編纂史料」可能是我們團隊的特徵之一。之所以出版口述記錄集，其實和日本的中國農村調查的傳統也有關係。中國農村慣行調查以及濱島敦俊、三谷孝、佐佐木衛的調查，都將口述訪問整理出版，這也使得學者們以及一般讀者可以檢證他們的研究。文獻史料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到，但採訪記錄只要我們不整理，誰都無法去檢證我們的研究，這會使得調查的科學性和實證性大幅地減弱。我們並沒有特意去「編纂史料」，但從結果上來看，對其他人來說我們似乎著眼在「編纂史料」。

問：請問為何會用中文出版？

答：我們的採訪是以中文進行的。為了確保史料的性質，就理所當然地使用中文出版了。更嚴密地說，其實我們應該按照受訪者的方言來整理，但這樣的話需要用吳語整理，會消耗很多勞力。從這一點來看，我們的口述整理還有完善的餘地。等將來可公開錄音的時候，要是有人能再確認我們的採訪的話，或許將會有其他嶄新的發現。據說我們的口述記錄集開始慢慢地被拿來引用，最近好像復旦大學的研究團隊正在閱讀這些記錄。大部分的研究，可能時間久了就會變得陳舊，但是記錄可能歷久不衰，時間越長其價值就越高。要是能有更多人來利用這些口述記錄集，對我們來說是無比的榮幸。

問：在調查中有沒有「被防範」的時候？另外，在調查中有什麼特別注意的事項嗎？

答：在採訪的過程中，我們當然盡可能避開受訪者不想講述的內容。第一代的調查是在戰爭時期的情況下，而第二代的調查則是在政府官員的監督下進行的。與他們相比，我們的採訪是在受訪者家中，或是他們平時習慣生活的環境中進行的，可說是在平等的關係下採訪到了他們的真心話。這也是我們與前兩代調查有所不同之處。當然我們也有「被防範」的時候。我記得2006年、2007年採訪漁民的民間信仰時，有些漁民的戒備心很強。據我們私下瞭解，他們在1950年代被視為「會道門」，當時曾受到嚴厲的鎮壓。因此，有些老人擔心我們會把他們的信息洩漏給政府，進而對他們不利。為

了得到他們的理解及建立信賴關係，我們細心地說明科研調查目的，還保證只用於學術研究，絕不公開實名。

（二）田野調查的課題與展望

問：關於田野調查，您覺得有什麼不足之處嗎？

答：不得不說我們的田野調查還存在著一些問題。其中一點是漁民和農民的關係。我們團隊試圖以漁民為中心，分析水上居民生活；在調查中收集了大量關於漁民生命史的口述記錄，可說是我們重要的成果之一，在當時具有一定的先驅性。但現在回想一下，我們似乎將水上人和陸上人區分得太明晰了。這可能是因為我們受到中國共產黨在集體化時期以戶口政策為首的各種政策所影響。那時我們完全以中國共產黨的分類為前提進行調查，認為漁民一直都是漁民，農民一直都是農民。但華南的水上居民研究已闡明，其實水上和陸上並沒有分得那麼明顯；有陸上人去水上的情況，也有水上人買到土地後上陸發展的情況。我們需要結合各地域的脈絡和時代的脈絡，去理解其中複雜的相互關係。現在很後悔在調查時沒能注意到這些問題。

另一點由於受到濱島敦俊教授的影響，我們將重點放在口述調查上，沒能進行更綜合性的田野調查。例如，通過更多對禮儀的觀察來考察其如何成立的，包括有怎樣的改變、與其它地域有何不同、現實中與文獻中的禮儀有何不同等等。還有就是對石碑也沒能進行充分的調查。可能是因為當時我們認為江南沒有太多的石碑，所以就忽略了。華南學派的調查方法常常被說成是「進村找廟，進廟找碑」，但這並不代表他們的調查方法單一，反而是他們更深入地理解地域社會的表現。廟是生活在基層社會人們的秩序及社會整合的核心，所以找廟；石碑是為將在這樣民間的公共空間中發生的、各個時代不同的事件告示人們而豎立的，所以找石碑。我們有必要更重視寫在石碑上的內容，從中讀取相關的信息，並根據其內容進行口述訪問。另外，吳滔常常提到的在當地閱讀史料，也是我們的不足之處。例如景觀就是很重要的元素，因為景觀的形成及變化是人們各種行為所積累的結果。我們要想真正地讀透地方志，也需要結合地方的景觀和脈絡。那時我們沒能有意識地將景觀

和被講述的生命史結合在一起，以更綜合的辦法理解地域社會。2011 年通過吳滔的介紹，我參加了科大衛教授主持的大型科研項目的田野調查。讓我記憶猶新的是，他們將相關史料裝訂成一本史料集，一邊閱讀這些史料一邊進行調查。這樣的方法讓我學到了很多東西，是十分寶貴的經驗。

基於以上反思，迄今進行的第四期調查中，我們有意識地收集石碑上的碑文，注重對景觀和廟會的持續觀察，以及在當地閱讀石碑和地方志等史料。希望這些反思可使第四期的調查超過之前的三期，也希望通過師徒關係將這些田野知識傳授給下一代。

五、未來計劃

（一）今後的研究計劃

問：能分享一下您今後的研究計劃嗎？

答：現在進行的是第四期的調查。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有些計劃很難預測。就現階段來說，我今後有兩個想要研究的課題。第一個是水域社會史研究。該題目與田野調查的反思有關，就是想探討水上人和陸上人間複雜的相互關係。濱島教授曾指出，以分圩為首的江南水邊開發，特別是工程開發在清代初期就已結束了。然而，受到太平天國的影響出現了很多空地，在耕作不足的情況下從各地召集開墾戶，結果大量移民在湖田地帶生活，或是開發這些水邊地帶。因此，我們需要思考水域社會是如何被開發的、人們是怎樣適應的等問題。與之同樣重要的是，在長江沿岸以及沿海地帶被稱為「沙田」的沖積平原。江南的沙田主要由蘇北人或來自其它地域的人開發。在此過程中，本地人和這些族群的關係也發生種種變化。我們通過對更長時期水邊社會的開發，以及流動的水域社會分析，可以瞭解到江南的開發並不是在 17 世紀初結束，而是直到近代還一直連綿不斷。我希望通過對水域社會的開發和紛爭，以及社會秩序形成的探討，來填補這一研究史上的空白。近年，劉詩古、徐斌等華南學派第二代的學者開始關注水域社會史，並出版了優秀的著作。我希望吸取他們的成

果和觀點，對江南的水域社會史展開研究。其實，現在在第四期的項目中所調查的蘇州西部，原本也是水邊地帶，好像是在明代開發出來的。如果將其也視為水域社會的話，我想我們會獲得一些新的線索。最近我還在設想，整個江南實際上就是一個水域社會，我們需要通過對江南水域社會的分析，來闡明做為水域社會的江南。更進一步說，可以將華南及長江流域也視為水域社會來展開討論。總而言之，通過對水域社會的研究，能讓我們從不同的角度重新理解近千年的中國史。現在這點還只是處於粗略的構思階段，希望通過第四期、第五期、第六期的調查，以及與國內外相關學者的交流，能夠更加深化這一論點。

另外一個是有意識地從歷史學的角度研究改革開放史，特別是 1978 年到 1990 年代初改革開放初期的地域社會。對於進行田野調查的學者來說，同時代的歷史以及接近同時代的內容，也是重要的調查對象。因為只要採訪受訪者的生命史，就自然而然地對同時代的經歷也會有所瞭解。2004 年剛剛開始調查的時候，1980 年代還是一個離我們很近的時代，所以我們的口述調查主要是圍繞 1949 年前後的變化，也就是國民政府末期以及土地改革、集體化時期的內容。現在已經很難遇到瞭解這個時期的受訪者了，我們只能對 1960 年代以後的經歷者進行詳細的口述訪問。當然，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內容也非常重要，但 1978 年以後的改革開放政策，特別是人民公社的解體、承包到戶、鄉鎮企業、農村副業等給地域社會帶來的變化，是不可忽略的事實。假如我們採訪 1948 年出生的受訪者，在 1978 年的改革開放時他 30 歲，現在已經 73 歲了。要是十年後採訪他的話就已經 83 歲了，我想那樣的話在採訪過程中會遇到很大的困難。所以我覺得我們有必要從現在開始有意識地對改革開放時期的內容進行口述訪問。通過對改革開放時期的分析，還可以得到思考集體化時期地域社會的線索。因此，從歷史學研究的角度對同時代的重要轉折點進行研究，也可以讓我們追溯探索之前的時代。我想與幾位有同樣興趣的國內外學者，就改革開放時期的地域社會史研究進行一些學習和討論，並為將來的研究做好準備。我想這項研究最少也需要十至十五年吧。

（二）日本的中國史研究

問：最後，能請您講一下這些年日本的中國史研究的變化，以及今後應有的發展方向嗎？

答：之前與劉志偉教授和鄭振滿教授聊天，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提到年輕時很多史料都看不到，十分羨慕日本和美國等海外學者可以利用各種史料。譬如與當地學者相比，那個時代的日本或是美國學者能看到更多、更詳細的地方志。因此，直到1990年代中期，許多中國學者都參考日本的中國史研究。之後中國方面的史料挖掘和整理工作，以及近年的資料庫建設飛速進展，各地方大學都致力於地方民間文獻的挖掘，並創建了龐大的數據庫。外國學者很難直接地參與到這些工作之中，或是去利用這些史料。因此，很多中國學者都認為自己更加瞭解本國史或地域史，除了方法論之外，參考日本或海外的研究已毫無必要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日本的中國史學者到底能做什麼呢？這也是近年讓我十分糾結的問題。對此，我有三個看法。

第一點是從不同的文化和價值觀去看中國，也就是從與中國學者完全不一樣的角度去展開研究。譬如有意識地與日本社會或日本的價值觀進行對比。由於我們看待問題的前提與他們不同，所以需要從自己的前提和角度觀察那些對於中國學者理所當然的事實，這也有可能讓我提出一些值得中國學者參考的、外部人所見的中國形象。另外，日本學者的最大特點在對史料細緻的閱讀。我們需要更進一步地思考史料是如何編撰的、有什麼樣的限制、其內容是如何記載的，亦即史料生成的「磁場」和史料內容的「磁場」。這能讓我們展開更詳盡的討論，將外部觀察者的理解與詳盡的討論相互結

合，因為兩者是關聯的。

第二點是日文史料的運用。日本學者有利用日文的優勢，我們可以更積極地使用一些日方的史料。我剛剛介紹的日本中國農村調查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不同世代在不同時代的調查，積累了很多不同的中國農村記憶。我們需要分析調查本身是怎樣展開的，甚至各個時代記憶的「磁場」是什麼等問題，並將自身的調查成果加進去以展開更為細緻地探討。通過這樣的努力，將可找到一些與中國學者對話的線索。

第三點，我認為可注重日本漢學學術體系的形態，也就是學術體系成立的制度背景，以及由此獲得的知識稜鏡的方式。更進一步說，通過史料內容本身理解、觀察中國固然重要，但也需要思考觀察者是如何放置其觀察視角的，即理解其觀察的本身。我一直參加東洋文庫的近代中國研究班，在那裡曾試圖由日本戰爭期間的華中、華南調查，理解中國是如何被觀察、如何被描述出來的。在思考日本學術體系時，高等教育機關曾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我現在比較感興趣的，包括一橋大學、神戶大學在內的「舊三商大」，和山口、長崎、橫濱等各地的舊高等商業學校在戰爭期間所建立的機構，譬如東亞研究所或東亞經濟研究所等機構的調查活動。我希望可以探討它們是如何被建立的？是基於什麼背景或政策需求？有誰參加活動？如何收集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各地的信息？以怎樣的視角進行觀察的？從中描述出來的中國或東亞又是什麼……等等。從這些問題中所看到的中國或東亞是日本獨特的觀點。通過類似分析，可以找出一些與中國學者對話的材料。特別是在今日這樣的疫情時代，更應該好好利用一些身邊的史料。